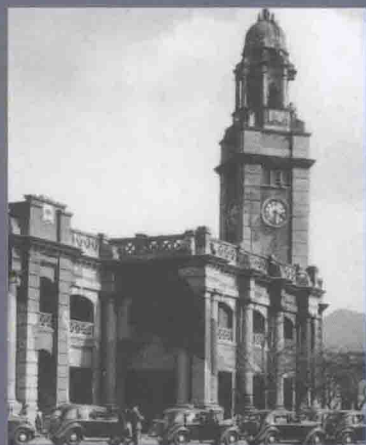




香港：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陈平原 陈国球 王德威 编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香港：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陈平原 陈国球 王德威 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香港: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陈平原等编.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3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ISBN 978-7-301-25576-6

I. ①香… II. ①陈… III. ①香港—地方史—现代 IV. ①K296.5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4886号

书 名 香港: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

著作责任者 陈平原 陈国球 王德威 编

责任编辑 刘 洋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5576-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32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7.75印张 412千字

2015年3月第1版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6.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 总序

陈平原

美国学者 Richard Lehan 在其所著《文学中的城市》(*The City in Literatur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中,将“文学想象”作为“城市演进”利弊得失之“编年史”来阅读;在他看来,城市建设和文学文本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阅读城市也就成了另一种方式的文本阅读。这种阅读还关系到理智的以及文化的历史:它既丰富了城市本身,也丰富了城市被文学想象所描述的方式。”(第 289 页)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所极力理解并欣然接受的“北京”“上海”或“西安”,同样也是城市历史与文学想象的混合物。

讨论都市人口增长的曲线,或者供水及排污系统的设计,非我辈所长与所愿;我们的兴趣是,在拥挤的人群中漫步,观察这座城市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保留想象与质疑的权利。偶尔有空,则品鉴历史,收藏记忆,发掘传统,体验精神,甚至做梦、写诗。关注的不是区域文化,而是都市生活;不是纯粹的史地或经济,而是城与人的关系。虽有文明史建构或文学史叙述的野心,但更希望像波德莱尔观察巴黎、狄更斯描写伦敦那样,理解北京、上海、西安等都市的七情六欲、喜怒哀乐。如此兼及“历史”

与“文学”，当然是我辈学人的学科背景决定的。

谈论“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必须兼及建筑、历史、世相、风物、作家、作品等，在政治史、文化史与文学史的多重视野中展开论述。若汉唐长安、汉魏洛阳、六朝金陵、北宋开封、南宋临安、明清的苏州与扬州、晚清的广州与上海、近现代的天津与香港及台北，以及八百年古都北京，还有抗战中的重庆与昆明等，都值得研究者认真关注。如此“关注”，自然不会局限于传统的“风物记载”与“掌故之学”，对城市形态、历史、精神的把握，需要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坚实的学术训练；因此，希望综合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温情以及旅行者好奇的目光，关注、体贴、描述、发掘自己感兴趣的“这一个”城市。

关于都市的论述，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有多种角度与方法。就像所有的回忆，永远是不完整的，既可能无限接近目标，也可能渐行渐远——正是在这遗忘（误解）与记忆（再创造）的巨大张力中，人类精神得以不断向前延伸。总有忘不掉的，也总有记不起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使得我们不断谈论这座城市、这段历史。在这个意义上，记忆不仅仅是工具，也不仅仅是过程，它本身也可以成为舞台，甚至构成一种创造历史的力量。

既然我们对于城市的“记忆”，可能凭借文字、图像、声音，乃至各种实物形态，今人之谈论“都市想象”，尽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无言的建筑、遥远的记忆、严谨的实录、夸饰的漫画、怪诞的传说、歧义的诠释……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珍惜，并努力去寻幽探微深入辨析。相对于诗人的感伤、客子的怀旧或者斗士的抗争，学院派对于曾流光溢彩的“都市生活”的描述与阐释，细针密缝，冷静而客观，或许不太热闹，也不太好看，但却是我们进入历史乃至畅想未来的重要通道，必须给予足够的理解与欣赏。

本丛书充分尊重研究者的眼光、趣味与学术个性，可以是正宗的“城市研究”，也可以是“文学中的城市”；可以兼及古今，也可以比较中外；可以专注某一城市，也可以城城联姻或城乡对峙；可以阐释建筑与景观，也可以讨论舆论环境或文学生产；可以侧重史学，也可以偏于艺术或文化。一句话，只要是对于“都市”的精彩解读，不讲家法，无论流派，我们全都“虚位以待”。

2008年7月22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序 言

陈平原

又是一次“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2011年10月召开的“开封：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论文集2013年1月就刊行了；反而是2010年12月召开的“香港：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拖到今天才出书，实在惭愧。之所以如此“步履蹒跚”，有主客观各方面的原因，不说也罢。唯一想强调的是，此举更让我明白，选择香港作为论述对象，确实很有必要。

记得和王德威讨论下次“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系列国际研讨会在哪里开，我一口咬定就是香港，除了因近年在港中大教书，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更因我深感作为研究对象的“香港”，长期被严重忽略。这一点，是我到香港教书后才逐渐体会到的。

按理说，1991年春我在港中大呆过四个月，对这座城市并不陌生。可为了中大讲论会的课程，我还是恶补了一阵子有关香港的社会、历史、宗教、建筑、文化、文学等知识。说实话，给我最大刺激的，还属卢玮銮（小思）教授编著的两本文学书——《香港文学散步》（增订版，香港：商务印书馆，2007年）让我学会“行脚与倾听”（借用黄继持“引言”题目）；《香港的忧郁——文人笔下的香港（1925—1941）》（香港：华风书局，1983年）则让我理

解香港人平日深藏不露的情感。正如卢玮銓在《序》中所说:“多少年来,在交通、经济的角度看,这小岛愈来愈受重视,没有人会否认她的重要性,但奇怪的是也从没有什么人真正爱过她。……选了适夷《香港的忧郁》作书名,并不是说那是篇特别重要的文章,只是,我觉得这名字,很配合香港的遭遇和性格。”此序言写于1983年,十四年后,香港回归中国,曾引起国人强烈的自豪感。那段时间,大陆媒体上充斥各种关于香港基本情况的介绍。

只是时过境迁,还有多少大陆民众关心香港的历史与现状、政治与法律、学术与文化,以及香港人的前世今生、喜怒哀乐?说起来,不外是国际金融中心、购物天堂、美食圣地;电影业曾经很辉煌,流行音乐也不错;至于人物嘛,商业有李嘉诚,学术有饶宗颐,作家有金庸;演艺明星可就多了,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比如死去的张国荣、梅艳芳,活着的周润发、梁朝伟,还有那擅长搞笑的喜剧天才周星驰……如果我没记错,这就是一般大陆民众心目中的香港。

可这就是香港吗?记得陈国球曾撰《收编香港——中国文学史里的香港文学》(2002年),谈及大陆的文学史家是如何一厢情愿地“驯悍香港”的:“一是以‘现实主义’为批评基准,肯定那些批判‘香港社会黑暗’的作家和作品”;“一是强调个别作家的怀土之情,如果能够歌颂‘统一’、‘回归’,当然是最好的展品”。陈文之所以语带嘲讽,是明显地不满香港这种长期的“被书写”的命运。如此主体性意识,在“九七回归”前后,曾得到很大的强化。而回过头来看大陆民众,则依旧按照自己的趣味,讲述他们所理解的“香港故事”;就连学者也都不觉得有调整自己立场、认真倾听港人声音的必要。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视觉上的“错位”,变得越来越严重。

不说别的,就谈文学及文化。记得1989年年初,我来港参加“文学创作文化反思”研讨会,黄继持、卢玮銓送我好多册《八方》文艺丛刊。当时特别感慨,大陆没有这么视野开阔、印刷精美的文艺杂志。二十多年过去了,我熟悉的北京、上海、广州的文化及学术界正急起直追,不再让香港专美于前。换一种说法,在某些方面,香港其实已经落后了。正是有感于此,陈国球、王德威和我精诚合作,邀请近百位研究香港文学、绘画、电影、新闻、建筑的专家学者,从“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角度,关注香港这座国际性大都市的前

世今生,希望借此给“香港文化”加油打气。

邀请信上,提供给与会代表的参考议题包括:(1)晚清以来香港的文化生产,如教育、出版、文学、绘画、摄影、音乐、电影、戏剧,以至商业设计等;(2)晚清以来香港的社会生活、建筑风格、语言变迁;(3)晚清以来不同时段、不同媒介、不同文类所呈现的“香港”;(4)晚清以来作家的都市体验与文学表现的关系;(5)作为思想主体与作为表现对象的“香港人”;(6)殖民、去殖民、后殖民情境与“香港书写”;(7)不同媒介、不同文类中香港与其他城市关系的想象。设想不见得落实,计划也不等于业绩,上述议题,有的得到充分论述,有的则无人问津。

而在会议的闭幕式上,我谈了三点设想:

第一,原计划邀请更多的外国学者,可实际到会的,除了东亚,再就是美国的华裔学者。不是组织者不用心,此乃学界的现状。若开“上海”或“北京”的研讨会,我们很容易在欧美学界请到好学者。可见,作为“都市研究”对象的“香港”,尚未成为热门课题。建议香港政府跟学界合作,编纂《香港文学大系》和《香港学术文库》,赠送各国大学及图书馆,以吸引学界的关注。十年后,方才可能有好的研究成果。

第二,走出纯粹的“香港文学研究”格局。香港中文大学有“香港文学中心”,香港教育学院计划编辑《香港文学大系》,这都很好,是我们整个事业的根基。但“都市研究”最好是跨学科的——若人文学及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专家学者能有更多“同台表演”的机会,通过深入的对话,增进相互间的了解,那样激发灵感,可能出大成果。

第三,学院中人,必须学会与公众对话,能上能下,能雅能俗,能深能浅,那才是比较理想的状态。此次会议因议题的关系,得到诸多香港媒体的关注,会前专访,会后刊文,效果很不错。记得胡适说过,有人称羡他地位特殊,有说话的自由,而他的解释是:我的自由是自己一点一点争取来的。当今世界,各国大学里的人文学者,因学术评鉴的关系,大都变得日渐封闭,不太愿意跟公众对话,这可不是好现象。尤其是都市文化研究,宁愿屡败屡战,也不可采取“不全宁无”的姿态,拒人于千里之外。

会议终于圆满结束了,讨论如何编论文集时,我出了两个馊主意:第一,

论文集最好在大陆出版，主要不是考虑印数，而是希望更多大陆读者了解香港，尤其是理解香港学者的立场及思路；第二，评审论文时，自觉向香港学者倾斜——只要说得过去的，尽可能选入。正因这两个建议，日后论文集在编辑出版过程中，碰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

好在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及各位作者的不懈努力，论文集即将刊行。我总算可以松一口气了。经历了这么一番磨练，更坚定我当初的预感：谈论香港，很可能比谈论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复杂得多。也正因此，这个话题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值得后来者认真耕耘。

本书共分五辑，前两辑乃传统的文史研究，只是因政局变化，分为上下篇；第三辑讨论香港电影；第四辑则是在冷战大背景下，谈论港台及东南亚文坛的互动；第五组很特别，是两位建筑师的工作理念与保育体会。

最后，请允许我代表另外两个编者陈国球、王德威，向参加此次会议的全体代表（限于篇幅，很多论文无法入选），以及提供经费支持的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教育学院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北美蒋经国基金校际汉学中心，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4年8月28日于香港中文大学客舍

目 录

“都市想象与文化记忆丛书”总序/陈平原/1

序言/陈平原/1

文学的香港史

——十个关键时刻/王德威/1

五四运动在香港的初期发展

——以《华字日报》为中心的考察/陈学然/10

省港声色味

——从20世纪20年代两地画报所见/程美宝/28

开岛百年无此会

——1920年代香港北山诗社研究/程中山/52

“在”香港的儿童副刊

——《星岛日报·儿童乐园》研究(1948—1949)/霍玉英/76

人间画会:20世纪40年代后期香港左翼美术社团小考/陈 莺/101

六十年前的香港想象

——初论冯宏道《五十年后之香港》/张咏梅/126

两位散文家笔下香港的山

——城市香港的另类想象/樊善标/145

我见青山多妩媚

——叶灵凤、李欧梵的“香港书写”/陈平原/160

“包括在外”，排除在内，华语语系叙事策略

——重绘金庸侠义地形图/宋伟杰/165

本土的自创与解体

——从《我城》到《白发阿娥及其他》/陈智德/180

殖民城市的记忆与遗忘

——论香港现代主义诗人梁秉钧的诗歌特色/区仲桃/194

香港：边缘的政治/赵稀方/207

以影犯禁

——战后香港电影的政治审查/吴国坤/217

1950—1960 年代香港电影的现代性

——以巴金《家》的电影改编为主/山口守(Yamaguchi Mamoru)/230

幽灵人间·鬼味香港/陈丽芬/246

张爱玲《色，戒》电影改编在香港的接受情况/何杏枫/263

舞照跳

——香港电影与文学中的舞厅文化与城市想象/黄念欣/280

20 世纪香港戏剧的文化政治

——几个现象概述/卢伟力/293

香港·1941

——田汉话剧中的“香港”再现/徐 霞/307

台湾视野下的香港文学/陈国球/325

香港文学生产场域与 1950 年代文学史叙述/应凤凰/341

马朗五六十年的双城记

——以台港现代主义文学跨区域传播为焦点/须文蔚/356

落在香港、吉隆坡和纽约的雨

——杨际光的离散现代性/庄华兴/376

集体记忆的保留抑或设计传统的延续

——关于香港 1940—1970 年代现代建筑设计

成就的研究/顾大庆/390

建筑保育与本土文化/林中伟/407

文学的香港史

——十个关键时刻

美国哈佛大学 王德威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们一起关注香港的城市历史,以及以都市为基础的文化记忆。我感到很惭愧,虽然到过香港多次,对香港文学也有一些涉猎,但谈不上是专家。以下回顾我个人对于香港文学或是广义的香港文化史的一些发现和心得。题目定得有点悚动:文学的香港史——十个关键时刻。为什么以“十个关键时刻”作为切入香港文学史或文学的香港史呢?

通常讲关键时刻,指的是历史的某某关键点。我们强调这个关键点代表的起承转合的意义。“关键”二字在北齐时已经提出来了,原指特别的对象装置,用以开关或合拢对象,例如门栓就是关键最早的说法。此后延伸千百年,我们常常说关键作用、关键时刻,特别指对事物起决定作用的部分。看待文学史或文化史的时候,往往希望在这些流变的时空中,找出一些重要

转折点,并且命为关键时刻,意思是锁定某些时间点,以此为枢纽,发展出起承转合的论述。这是我们看待历史,书写历史,记忆历史的一种方式。但现在我提出一个不同的看法。我们谈“关键时刻”时,把“时刻”也突显出来,而把“关键”放在历史流程中。我要说时间的流变未曾或已,我们总是在时间的进程中或时间不同的转折构造中,来观察、来生活、来经验历史经验。我们往往一厢情愿指证某个时间点,认定它是一个关键时刻,但忽略了一个事实,在时间不断行进、流变、重新组合的过程里,这样一种指证、记名的方式难免有抽刀断水水更流的弊端。看待未来或过去,不同时间的组合方式,总是可以找到关键时刻,发展出不同的论述。

我认为,与其说关键时刻是“锁定”历史意义的要素,不如说关键时刻是“开启”历史意义的契机。与其说把以下所介绍的十个关键时刻看做我们对香港文学史或文化史命名不可或缺的一种介入方式,不如把这些关键时刻视为开启更多、更复杂,甚至充满矛盾,看待香港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可能性而已。在时间的开始和关闭之间,在偶然与必然之间,这些因素成为互为表里、辩证或对话的网络。历史因为对关键有不同的解释,变得更加繁复,更需要继续思考。

相对目前对香港文学史或文化史的叙述,香港在整个广义的时空版图上,它的位置也许非常渺小,甚至无足轻重。但今天我们这样的大型会议在这里举行,似乎又见证我们也认同香港代表了各种不同的关键意义。从宏观历史角度提到香港时,它的意义立刻浮现,例如百年殖民经验和帝国历史,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对照的场所,中央集权与特别行政区主权的对话等,这些都是香港的历史政治经验所赋予香港的要素。事实上,我觉得这些关键时刻似乎不能穷尽香港给予我们的更丰富的历史含义。

我个人认为这些含义尤其显现在我们对香港文学的态度上。香港文学——听起来似自相矛盾的陈述词,香港有文学吗?香港文学真的那么重要吗?香港文学在广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怎样的位置?它似乎隐而不见,我们通常认为香港文学无足轻重,但一旦指证、认识,它的关键位置又是如何的呢?在虚构和实践方面,到底香港文学,或推而广之说,以文学为坐标的香港历史,到底是虚构的陈述,还是我们真正念兹在兹的实践呢?在

彰显和遮蔽,在香港文学实践的过程里,它包含各种各样世俗、日常生活的要素,报纸专栏上有梁凤仪、亦舒、李碧华的连载小说,另一方面,香港文学又绝对前卫,例如董启章、利瓦伊怡的作品。强烈的冲突代表了香港文学的另一面向。香港文学是“欲望”的指南,让我们对香港的未来和过去的可能性展开遐想,也可能是“否想”。以文学为坐标,对香港历史有不同介入的方式,在约定俗成、传统定义的“关键”意义上来说,香港文学史代表的关键地位恰恰在两种不同的——重要和不重要、彰显和遮蔽、欲望与“否想”之间产生了游移的位置。

我的结论是,以大陆做坐标,以宏观的叙事或形式作文学史脉络的做法,无从捕捉香港文学,或香港文学史、香港文化史的定位。正视香港复杂、往往自相矛盾、关键同时未必关键的位置,不断尝试开启和锁定香港在时间流变中的位置,一种不同的文学史观才能逐渐突现出来。

以下提出也许是真正关键,也许是无足轻重的十个香港时刻。我再次强调“时刻”本身不确定的意义,“时刻”引导我们进入复杂繁复的历史坐标或历史版图,只有我们正视文学作为历史的方法,才能理解文学比历史更曲折地呈现了过去,比正规历史呈现更多未来。我们应该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让记忆播散。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才是香港历史最后的隐喻。在虚和实之间,我们不断努力尝试认识香港的意义。

我提出十个可能的时间点,希望大家多加批评。

传统的香港文学史,往往会提到王韬 1862 年后和香港发生的种种因缘,或提到世纪之交,黄世仲(小配)来回广东、香港之间,创作的一系列小说,如《洪秀全演义》,以及他办的杂志,这些杂志与政治挂钩的可能性等。或者还会提到世纪之交,以香港作为坐标的出版品,像《粤东小说林》、《中外小说林》等。在广州或南粤区域主编出版,但参与制作和写作的文化人来往于港澳之间,而且书写内容涉及当时香港的情况,这也是香港文学的另外一个起点。在以新文学做坐标的定义下提到的香港文学史,往往定位在 1920 年代末期,比如 1928 年出版的《伴侣》杂志,往往被作为新文学的起点。从封面看得出,《伴侣》的调性偏软,有许多介乎鸳鸯蝴蝶派和我们今天定义为纯文学的不同论述交界的地方。

但如果我来命名香港新文学或纯文学的开端,第一个时间点也许是1929年9月15日。这一天《铁马》创刊了,这是只出了一期的短命杂志。阅读《铁马》的目标特别放在作家侣伦身上(1911—1988)。1929年,侣伦18岁,在《铁马》上发表小说《炉边》,小说写的是在香港从事文学创作的生态纪实。18岁的侣伦似已历经沧桑,哀叹在香港文学创作者的不易,绞尽脑汁花费心血写出的作品,送到百无聊赖的编辑手中后,编辑却坐在炉边随意看看,不小心把稿子丢进炉里烧掉了。《炉边》似乎预示了作为一个香港的文学创作者实不易为。但只要有文学志业的存在,就有人前仆后继写作。侣伦的生命历程说明了香港文人的多变性。他早期的作品《黑丽拉》充满新感觉派现代又有点颓废的写作风格。1952年中期的作品《穷巷》转而批判现实社会,其中的改变可以理解他与香港的感情或与“感觉结构”间的互动,从现代派或广义现代派作家,到广义现实主义作家,其间角色的变幻,耐人寻味。侣伦一生只有三年在中国大陆度过,其他时间作为编者或作家介入香港文学和历史的场景,所以1929年9月15日这件小事情,可以作为当时的隐喻,映照香港作家所做的选择、考验和冒险。

1941年12月8日——第二个关键时刻,大历史上都不会忘记的。日本人在珍珠港事件后,快速攻入香港,这一天香港大学正好举行期末考试,女学生盛九莉和她的同班同学准备考试时听说战争爆发了,一时间感到意外的解放。同时,有一对乱世男女范柳原和白流苏谈着恋爱,就在胶着不清的阶段,日本人的炮弹打过来了;他们突然知道乱世之下倾城之恋的必要性。

这当然是张爱玲的小说里的情节;1943年的《倾城之恋》,1976年写成,2009出版的《小团圆》。张爱玲1939年到香港大学念书,无可讳言,1941年的经验成了她创作里挥之不去的历史印记。而历史事件化成张爱玲笔下的风花雪月,才显现出意义。1950年代末期,张爱玲笔下的战时经验,甚至成为以英文写出的 *The Book of Change* (《易经》) 整个故事的骨干。

大历史小历史的碰撞下,故事继续展开。范柳原和白流苏结婚回上海,日子不好过,所谓有情人终成眷属,毕竟是虚构才有的事情。二人终于走上离婚的路。1997年,范柳原居然还活着,垂垂老矣,重回香港,还想见见白流苏,白流苏却早已嫁了别人,在商场上颇有斩获,成了富孀。范柳原千回

百转思考,明白自己浪费了整个人生,写了怆情录给白流苏(李欧梵 Leo Ou-Fan Lee 著《范柳原怆情录》)。范柳原其实有个英文名字 Leonard Fan 或 Leo Fan,Leo Fan 整容以后,显得十分年轻,充满文学才华。

第三个时间点是1952年7月25日。这一天《中国学生周报》创刊,它成了香港报刊史上的重要媒介,给香港文学和文化带来典范性的转变,它的创办后面有许许多多历史因素相互激荡。1949年之后许多南来文人羁留香港,又有更早一批南来文人审时度势,回到大陆。这时候冷战文化政治在香港的舞台上已经展开。在美国新闻处支持下,冷战期间一系列文化刊物出版了,如《今日世界》,还有出版社成立,如友联。友联支持出版《中国学生周报》,美援的文化产物,竟是一本以中国文化为诉求的刊物。这里有复杂的线索交错:当时新亚书院为主的一群文人成为《中国学生周报》幕后重要的精神资源。在《中国学生周报》出刊的头几年,钱穆、唐君毅、张丕介等新亚重要创始人都有很深介入,他们觉得花叶飘零,但灵根自植。《中国学生周报》在文化对垒的冷战时代出版,始料未及的是,培养了一群重要作家,例如西西、亦舒,以及今天到了法国的绿骑士。他们都曾在《中国学生周报》的文学版试练笔锋,并且此后做出了重要的文学贡献。

《中国学生周报》由1952年出版至1974年,无可讳言,当时政治气氛敏感,美援文化又是非常特殊的现象,但它对日后现代主义或现代主义文学却有很大贡献。《中国学生周报》创办后,各种刊物陆续出现,1960年,左翼阵营出版了像崑南组织的《香港青年周报》,各种打对台的方式形成香港独特的文化现象。

第四个时间点——1955年2月8日开始,31岁的《大公报》编辑金庸先生,在总编罗孚建议下,开始写《书剑恩仇录》,这以后的故事也许就不必多说了。从1955年至1972年,金庸创作了十五部作品,成为我们今天回顾20世纪下半期广义的华语语系文学最重要、最受欢迎的作者之一。《书剑恩仇录》写作年份的前后,要注意故事隐含的意义。金庸这部小说在左翼《新晚报》发表,《新晚报》与《大公报》、《文汇报》延续了冷战政治一个特别的线索。《新晚报》以更民间更诉之于大众的风格来吸引读者或香港市民认同,幕后操盘人罗孚更是资深的左翼文化人。